

关于鲁迅参加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的文献史料簡介

沈 鵬 年

鲁迅先生光辉的一生和他的全部文学活动，都是跟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着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十大卷“鲁迅全集”，正是最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革命运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重要的一环——文化、思想战线上长期而曲折的斗争过程。与此同时，鲁迅先生还参加了一系列的、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他签署和发表了許多有关的宣言、通电和声明（包括书面意见和主张）。这些文件也和他的文章一样，是支持革命、打击敌人的斗争方式之一，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史实和文献资料，不仅对我们研究鲁迅的思想发展、了解他作品的战斗内容和时代背景，是一项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也为我们具体研究党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更好地学习他如何服务于革命的政治，提供了一种典范。为此，电影“鲁迅传”创作组在采訪工作中，在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和有关同志的协助下，曾比较注意地发掘、搜集并初步整理了这方面的有关文献和史料，对创作起了相当作用。但是，由于我们的见闻有限，收集工作还做得很不深入，所遗漏的一定还有不少。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和有关同志的帮助，以便进一步收集到更多的有关文献和史料。

现将这些文献资料的出处和来源，按照年代先后排列，简介如下（同时请参阅丁景唐同志的“鲁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一些文献资料”，刊“学术月刊”1961年第十期。凡是丁文中详细介绍过的，本文则从略；凡是我們新收集的，介绍则稍详。）：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

一、关于“新青年”編輯部分裂问题的信

“新青年”編輯部逐渐分裂的过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具体反映。在这个过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主义知识

份子与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斗争，是异常尖锐的。在斗争中鲜明地站在共产主义知识份子这一边，因而孤立了右翼势力，使胡适的阴谋不能得逞的，是鲁迅。而“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六封信”，是体现鲁迅在这个斗争中的立场和态度的一项最直接的资料。这六封信是：①陈独秀在1920年12月16日致胡适、高一涵；②胡适致陈独秀并经高一涵等传阅；③鲁迅在1921年1月3日致胡适；④李大钊致胡适；⑤胡适在1921年1月22日致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周作人、高一涵等八人；⑥陈独秀在1921年2月15日致胡适。其中第三信“鲁迅在1921年1月3日致胡适”已收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1页；但在第④信：“胡适致李、鲁、钱等八人”信后面，还有鲁迅本人及代周作人写的各一则意见，钱玄同附议鲁迅的意见等；在第⑤信“李大钊致胡适”中还转述了鲁迅的意见；在第⑥信中胡适也被迫转达了鲁迅“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这一组信的原件现存北京大学；此外，在1947年5月12日至16日的“文汇报”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页至第13页上均有转录。与此有关的文件，还可参阅：①“新青年”宣言，刊“新青年”七卷一号（1919年12月1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4页有转录。②“谈政治”，刊“新青年”八卷一号（1920年9月1日）。

（这两个材料并不是鲁迅执笔的，但这两篇文章中是包括了李大钊和鲁迅等部份意见在内的。因此可予参阅。）

一九二五年

二、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事件

鲁迅仗义支持女师大学生同反动校长杨蔭榆以及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除了后来收集在“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许多辉煌名文以外，他还曾或亲自起草，或联名签署了两个宣言，一个启事，代学生草拟了二个呈文。即：

1.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風潮宣言”

魯迅于1925年5月底亲自起草，并約集馬裕藻、沈尹默、錢玄同等七人联署。鉛印，原件存上海魯迅紀念館。刊于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及1961年10月号“新华月报”上。

2. “代拟北京女师大学生‘呈教育部文’”

魯迅于1925年5月12日为学生代拟。原迹存北京魯迅博物館。刊出处同上。

3. “代拟北京女师大学生‘續呈教育部文’”

魯迅于同年5月21日去女师大学生会，可能即于此时代拟。原迹存北京魯迅博物館。刊于“魯迅生平事迹”图片第18頁及1961年10月号“新华月报”上。

4. “发起女师大校务維持会启事”

魯迅于同年8月8日偕馬裕藻、孙逢禎、張貽惠、謝循初等六人联名发起。原件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全文如下：

“逕启者女子师范大学自校长解职以后，并名义上之負責者亦复无人，一切事务，亟待整理，冀中国唯一之女子最高学府不至陷于絕境。謹拟于八月十日下午二时在本校大礼堂开教員全体會議，共商善后之法，届时务希惠临，无任翹企。”

5. “反对教育总长的宣言”

魯迅于同年8月26日参加了北京大学教員“反对章士釗的宣言”。共同联署者有魯迅、錢玄同、朱希祖、沈尹默、馬衡、徐炳昶、陈大齐、馬裕藻等41人。原件鉛印，現陈列于北京魯迅博物館內。全文共有三段，其最后一节为：

“……自从他卷土重来以后，籍整頓学風的名目，行摧殘教育的計劃，对于女师大的風潮，不用公允的办法解决。竟用武装警察强迫解散該校，又用巡警老媽强迫拉出女生；直接压迫女师大，間接示威于教育界。并且可籍此压倒种种的爱国运动，达到他一网打尽的目的。

因为上列的緣故，所以今天我們要出来抵抗他，反对他为教育长官。”

这些文件如和他的杂文对照閱讀，可以幫助我們进一步理解魯迅当时之所以支持这次斗争的重大意义。

一九二六年

三、为“五卅惨案周年紀念”題字

魯迅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曾在“忽然想到”之（十）和（十一）等文中表示了鮮明的意見，这些意見和主張与瞿秋白同志在“响导”第129期发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精神是一致的。次年，正当他因“三一八”惨案被反动派通緝而避难期間，他还为紀念“五卅”的小册子題了封面：“北京师范大学、五卅惨案周年紀念册、魯迅題”。书內收集了“北京师大学生会为五卅惨案周年紀念宣言”、“五卅紀实”、“五卅与中国民众运动”、“五卅惨案后帝国主义者对付中国政策的变迁”等14篇文章。原书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一九二七年

四、和創造社共同签署发表“中国文学家对英宣言”

周恩来同志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論魯迅与郭沫若”中說：“他們（指魯、郭两人）在北伐期中，誰都沒有‘文人相輕’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此外，在1928年8月10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中有篇文章記着：“前年在广州，創造社发起反对英国出兵的宣言，魯迅是我們唯一的贊成者，他首先签了名字。”（見何大白作“文坛的五月”）这宣言曾在1927年4月“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三〇期上发表，題为“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識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前面还有一段前言說：“这个宣言是我們一种忍无可忍的表示。……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所以特别郑重。”这篇宣言写成的時間，当在同年2月22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敗之后，到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前的期間。

五、“四·一五”后向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山大学辞职的斗争及支援省港罢工

魯迅在“四·一五”以后向中山大学进行的辞职斗争，是他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誓不两立”的决絕态度的具体行动。即从“魯迅日記”上极簡略的記載来看，这次斗争也是非常复杂和尖銳的。如在4月15日的当天，他营救学生无效，當場宣布辞职；从4月19日到29日

他对付并拒见了中大副校长朱家骅的四次来访；从4月29日到5月25日，他四次复函中大当局，坚决拒绝了中山大学对他的四次挽留，并退还聘书和“辞却一切职务”；从4月22日到5月13日，他四次拒见了已操纵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的中大学生会派来的代表。——鲁迅辞职事件的本身，就是一次尖锐的政治斗争，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鲜明立场，和向青年们启示了哪里是光明、哪里是黑暗的真理。因此，随着他的辞职，大批青年学生纷纷退学了，这个事实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不得不被迫地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发动了12次要求他复职的访问，最后，却可耻地失败了。鲁迅致中大的四次复信，据日记所载是：“4月29日、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辞一切职务；”“5月3日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5月11日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5月25日上午复中大委员会信。”（见《鲁迅日记》上册624至628页）这些针锋相对的信，可惜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们希望现在中山大学的同志们能再次追查一下当时的档案，可能会发现一些线索。而当时中大当局为了稳定学生情绪并企图欺骗拉拢青年，曾在“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上发布过这样二条“布告”：

①“挽留周树人教授：日昨周树人教授再函委员会辞职，并将聘书附缴，经委员会去函慰留，略以‘本校革新伊始，主理教务，正赖鸿猷，何可遽予舍去。承示日内归里，悵望至殷，切希查照前函早日返校，共策进行’云云。”

②“文史科为缺课问题重要布告：本科教授周树人先生辞职，委员会正在挽留，在周先生未回校以前，所担功课，不能解决，但文艺论及小说史两科，有书可研究，如周先生本学期不能上课，将来仍可考试，给予单位。……5月18日”这两项反证，也为我们了解当时鲁迅的战斗情况提供了线索。

鲁迅在“四·一五”以后，另一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是：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他的全部文章中。但值得人们注意的，在他亲笔所写的日记中，曾记录了他积极支持

“赤色”工人群众组织的史实。——原来，6月19日是省港罢工纪念日，6月23日是沙基惨案纪念日，党领导的地下罢工委员会发动了两次三万多人的一大示威，在白色恐怖的广州又高举起无产阶级的红旗。当时鲁迅十分兴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淪亡。”（见《鲁迅译文集》第四卷第7页）由于示威遭到镇压，党领导的“赤色”群众组织“工人救伤队”，发起了秘密募捐。鲁迅在6月27日热情地对“广东救伤队”捐了款（见《鲁迅日记》上册第630页），表示了他对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支持。把这些史实和“野草题辞”、“‘小约翰’引言”、以及“三闲集”、“而已集”中的文章相互印证阅读，便可以更全面地看到鲁迅当时的精神面貌和这些杂文的深刻意义。

六、支持创造社筹备复活“创造周刊”

早在1926年11月7日，鲁迅在“两地书”（六十九）中写道：“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因此，当他在广州时便开始了和创造社的良好关系。当1927年10月，鲁迅和郭沫若先后到了上海以后，他们便进一步准备合作，恢复“创造周报”。郭沫若发动了郑伯奇和蒋光慈在同年11月9日往访了鲁迅，经鲁迅同意后，在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和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分别刊登了“‘创造周报’复活”的预告。（当时郭老生了一场重病，并拟出国。）广告上写着：编辑委员成仿吾、郑伯奇等四人，特约撰述员：鲁迅、麦克昂（即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李初梨、孟超等三十人。这则广告类似宣言，其中有一段说：“时代又已经前进得离我们很远了。文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头，至少也得跟在时代的尾后前进。……我们的文学革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今后要根据新的理论，发扬新的精神，努力新的创作，建设新的批评——我们将在复活的‘创造周报’开始新的简册。”关于这则广告，据郭老在致笔者的信中说：“原文系谁执笔，不记得了。但不是我是可以肯定的。在刊出之前，我

一定看过。……这广告，事前是得到鲁迅同意的。”

一九二八年

七、关于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

鲁迅到上海后不久，就和党领导的“革命互济会”发生了关系，捐过多次钱支持“互济会”的活动。他到上海后最早和共产党员正式联系和来往的，据夏衍同志回忆，就是“革命互济会”的张秋人同志。这个史实在“鲁迅日记”中也有所记载，如在1930年6月7日还有继续“以一百元捐助‘互济会’”等等。此外，有关记述鲁迅和“互济会”关系的资料，还有郁达夫的“回忆鲁迅”（宇宙风社出版）和冯雪峰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两文。与此有关的文献，还可参阅：①“中国互济运动的发展”，刊“世界文化”创刊号，内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组织状况及白色恐怖的情况；“中国革命互济会”主要工作的布置；经费的来源等三节。②“中国革命互济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1929年12月），原件现存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③“关于互济会工作的讨论”（1931年9月26日），文刊“理论与实际”特刊号，原件现存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

一九三〇年

八、关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2月15日，鲁迅出席了秘密举行的、党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并和沈端先（夏衍）、田汉、彭康、郁达夫等五十一人联名为发起人，在“萌芽”月刊一卷三期和“艺术月刊”创刊号及其他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宣言”，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查禁书报、检查新闻、封闭学校、禁止集会结社等反动措施，表示坚决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的自由而斗争。在当时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候，鲁迅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公开宣布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不久，鲁迅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率先呈请南京通缉鲁迅，因而他被迫离寓，在外面避难了几天。

九、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和成立

1929年冬，党指派夏衍、冯乃超等同志和鲁迅联系，商谈筹备建立文艺界统一组织的问题。鲁迅和党的关系便开始有了新的发展。1930年2月16日下午，夏衍、冯乃超、阳翰笙等同志又邀请了鲁迅、柔石、田汉、钱杏邨等共12人，在公啡咖啡馆举行新文学运动讨论会，检查了过去的工作，讨论和“确立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会上一致决定成立“左联”，并即席组成了筹备委员会。两星期以后的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会上，夏衍担任执行主席，鲁迅作了重要讲话，冯乃超宣读了纲领。鲁迅的讲话要点和冯乃超起草的纲领原稿，在事先均经过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研究，并得到党的同意的。这些文件：

①“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原刊于“萌芽”月刊第四期，收入“二心集”，现见“鲁迅全集”第4卷。

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原刊于“萌芽”月刊第四期。

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行动纲领（要点）”，原刊于“拓荒者”月刊第三期。

关于这一段史实，在电影“鲁迅传”创作组采访过程中，夏衍同志、阳翰笙同志、冯乃超同志、阿英同志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回忆。此外，见于文字记载的还有：①“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原刊“萌芽”月刊第三期。（“萌芽”和以下三种刊物，上海文艺出版社均有影印本）；②“左联成立名单”，原刊“拓荒者”月刊第三期；③“左联第一次大会记”，原刊“巴尔底山”第四期；④有关“左联消息”，原刊“萌芽”月刊第四、五期；⑤“左联的二次大会”，原刊“世界文化”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

十、关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大批革命作家

1931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即李伟森）和“左联”的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二十三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为了纪念牺牲同志，并在全世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面前揭露敌人的暴行，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得比罐头还严密

的恐怖統治，秘密地出版了“前哨”的“紀念战死者专号”，发布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作家思想家书”和鲁迅撰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最大的仇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了激烈的抗争和对牺牲烈士的最深切的悼念。（“前哨”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影印本。）

十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侵略事件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件，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九·一八”后的第三天，鲁迅在“文艺新闻”第29期“答文艺新闻社问”中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人民的目的：“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文收“二心集”）“左联”也于9月26日发布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的文化组织书”，刊于“文学导报”第八期第2页。

一九三二年

十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侵略事件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热烈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战争。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鲁迅、茅盾、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胡愈之、李易水（冯乃超）、华汉（阳翰笙）、叶圣陶、张天翼、叶华蒂（以群）、郁达夫、楼建南等四十三人联名签署发表“告世界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压迫中国民众反日反帝。这个“宣言”呼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团结一致，“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最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保护中国革命！”等号召。这个“宣言”刊于同年2月4日出版的“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烽火”第2号上。与此同时，鲁迅还写了“友邦惊诧论”、“战略关系”、“逃的辩护”等杂文，抨

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十三、庆祝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

1932年9月24日，是高尔基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在“高加索日报”上发表的四十周年。“左联”为此发出了“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的电文，这个电文由鲁迅、茅盾、突如（夏衍）、曹靖华、适夷等签署，发表在1932年11月15日出版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创刊号上。次年10月又被转载在周起应（周扬）编的“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中。

十四、庆祝中苏复交

鲁迅和柳亚子、茅盾、陈望道、胡愈之、周起应、沈端先等五十七人联合签署的“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最初刊于同年12月15日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

十五、为营救第三国际代表牛兰夫妇发表通电

柳亚子在“鲁迅先生九周年祭”中写道：“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为了第三国际党人牛兰夫妇在南京狱中绝食的事情，好像由达夫发起，在一个虹口的什么酒家开了个茶话会，到的人我和鲁迅先生外，有茅盾、田汉、洪深、陈望道、楼适夷等……，大家决议打电报到南京司法院……去请愿，签名的三十六人。……电报用快邮代电打去的，好像隔了半个月，批示来了，……毫无结果。我把这批示函请鲁迅先生转给大家看，……鲁迅先生给我回信（对司法院的打官腔），也说‘只好以一叹了之’呢。”（见1945年版“文萃”第五期）这个电文尚未发现。但在“文艺新闻”第58号（1932年6月6日出版）有一篇“中国作家发表营救牛兰宣言”，由陈望道等签署，但有部份名单未发表，希有关同志能予证实。

一九三三年

十六、庆祝绥拉菲摩维支七十寿辰和文学活动四十五周年紀念

1933年1月19日，是“铁流”作者的七十寿辰，也是他的文学活动四十五周年紀念。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写道：“对于绥拉菲摩

維支的祝賀日，我却发过一个祝电”（見全集卷六第310頁）。这个祝电，据曹靖华同志的“訪綏拉菲摩維支”中記述：“当时从苏联各地及全世界各角落里飞来的雪片似的賀电里，还有以魯迅先生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的賀电：‘……欣逢您七十寿辰，我們庆祝您用笔和枪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斗争过程中所作的工作……’。”

（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铁流”第247頁）这篇訪問記作于1933年3月20日，原刊于“文学”创刊号上。

十七、关于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

1927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進行大規模的反革命战争，在全国各地凶惡地殘杀革命战士、工农大众和进步知識分子。又先后成立了“中統局”和“軍統局”等特务机关，肆行法西斯暴政，摧殘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据当时报纸記載，仅1930年8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即有十四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橫遭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和法西斯毒霧瀰漫下，魯迅参加了以宋庆龄和蔡元培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发起和斗争。这是当时一个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統治、为保障人权而努力的人民团体。它“不但直接援助了許多在蒋介石獄中的革命者，使他們得到辯护或釋放，而且对蒋介石的反动恐怖統治作了严厉的抨击。”（見宋庆龄著“为新中国而奋斗”第3頁）魯迅在1月6日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的干事会，又在1月17日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員。（見“魯迅日記”）魯迅是这个組織的重要骨干，他的會員証是次于宋庆龄、蔡元培的第三号。他的活动事迹，不仅在他自己的著作里、日記里有着記載，而且在同时参加該会的輯存的“患难余生記”和郁达夫的“回忆魯迅”中也均有記載。关于該会的文献：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宣言”，鉛印。曾刊于同年1月18日“申报”。原件現存上海魯迅紀念館。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文收宋庆龄著：“为新中国而奋斗”中。

关于这个組織的几次主要斗争史实：①“告中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系指共产党人罗登賢、廖承志和陈賡同志），曾刊1933年4月“申报”，后收入宋著“为

新中国而奋斗”中；②“对青年作家应修人被害宣言”（中共江苏省委宣傳部长、左翼作家应修人同志于同年5月14日遇难），刊1933年5月“申报”及“中国論壇”二卷七号；③“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殘文化的抗議书”，“魯迅日記”同年5月13日記：“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領事館抗議法西斯暴行。”魯迅签名的这个“抗議书”曾刊于同年5月14日“申报”上。

此外，魯迅还坚持原则，对混入这个組織的胡适展开了尖銳的斗争。当时胡适窃占了“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职务，但当这个組織的北平代表，通过視察監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提出廢止“民国紧急治罪法”，积极营救被捕抗日学生时，胡适竟发表“民权的保障”，反对釋放政治犯，并連續在同年2月15日和21日向英文“字林西报”記者发表談話，強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府权”，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对政治犯“一点也沒有严刑拷打”。魯迅在3月1日写信給北平友人道：“聞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覓以見寄否？”（見“魯迅书簡”上册第117頁）他除写了“光明所到……”、“王道詩話”等文直接抨击胡适外，还在“民权保障同盟”的执委会議上提議开除胡适会籍，并得到大家贊同，后来这个开除胡适会籍的決議，便于同年3月的“申报”上。

十八、抗議日本反动派杀害小林多喜二

1933年2月20日，日本共产党文化运动领导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書記长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被日本反动政府毒刑拷打致死，魯迅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战友们，为此向日本反动政府提出了激烈的抗議；同时，对小林多喜二同志的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唁和支援，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些文件是：①“左联”的“为小林同志事件向日本政府抗議书”，刊于1933年4月13日“中国論壇”二卷四期；②“魯迅之弔詞：同志小林ノ死ヲ聞イテ”，唁电影印在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小林多喜二”书內，中譯在“譯文”1958年2月号第105頁上刊出；③“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启”，由魯迅、茅盾、陈望道、田汉、洪深、

叶圣陶、郁达夫等九人签署，刊于“中国論壇”及北平“左联”刊物“文学杂志”第二期。

十九、关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

1933年8、9月間，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远东會議在上海秘密召开。會議主持人宋庆龄說：“由于我們正处于严密監視之下，我們就必须严守秘密。連我自己都不曉得举行會議的地点，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时候，我被带到上海工厂区的一幢阴暗凄凉的小房子里。代表們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当我到达时，每一个人，連外賓在內，都坐在地板上，因为房間里唯一的家具是供秘书用的一張小桌子。我們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語之中进行报告和討論的。”（見宋庆龄：“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刊于1952年10月3日“人民日报”）鲁迅曾积极地参加了筹备工作，据具体負責筹备的同志說，由于党对他的关怀，沒有让他亲自出席这个极端危险的秘密會議（鲁迅当时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公开“通緝”的），但鲁迅对这次會議的召开是极为关心，并始終参与其事的。后来他在答复蕭紅的詢問時說：“会是开成的，費了許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結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鲁迅还自豪地告訴蕭紅說：“我加入的”。（見四版“鲁迅书簡”下冊第776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紅色中华”第129期（1933年11月26日）上，以整版篇幅对这次大会的經過作了詳細的报导。报导中介绍了“大会主席团”的名单，大会除了选举宋庆龄等九人为主席团外，还推举了“毛澤东、朱德、鲁迅、片山潜（日本）、高尔基（苏联）、巴比塞（法国）、台尔曼（德国）等为名誉主席”。会后，鲁迅还会晤了法国代表、著名作家伐揚·古久列，并和上海其他进步作家一起公开参加了伐揚·古久列的招待会。有关文献是：①“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由鲁迅、茅盾、田汉三人署名，文末注“八月十八日”鉛印，原件現存上海鲁迅紀念館，曾刊于“中国論壇”8月号，②左联“致上海反战會議各国代表的欢迎

詞”，刊“反战新聞”（1933年8月29日）；③“上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开幕宣言”，曾刊于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論壇”。

一九三四年

二十、关于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綫索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建立反帝統一战綫，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綱領。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等签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綱領”，响应中共主張，号召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签名在这个綱領上的达三千余人。关于鲁迅和这个組織的关系，有如下二条綫索：

苏联盖·培·爱倫堡作“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国苏維埃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中說：“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間，上海組成了一个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为首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好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大学者和教授都加入了这个組織。作家鲁迅变成了該会的积极活动者。”（見中共中央蒙綏分局宣傳部編“党史学习参考资料”第二輯第202頁）。

蕭三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紀念”中說：“日寇侵略中国的开始，他参加发起‘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見“人物与紀念”第202頁）

一九三六年

二十一、庆祝长征胜利

1936年春，鲁迅在得到紅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曾經想尽办法轉輾送去一个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祝賀长征胜利的电报，其中有一句話：“……在你們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将来。……”（見“文艺报”1956年第19号，樊宇同志提供的綫索。）可惜全文至今尚未找到。

二十二、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

1936年6月，鲁迅于病中在“我們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了名。在这份“意见”上签名的还有蔡元培、郭沫若、茅盾、周揚、沈

鈞儒、巴金、陈望道、艾思奇等一百四十人。

(但在“中国語文的新生”第三編上却署“蔡元培等六百八十八人”)这个“意見”刊于1936年7月出版的“文学丛报”第四期,又为“中国語文的新生”收入第三編中。現轉录在“中国現代出版史料”(乙編)第310頁)。

二十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1936年6月,魯迅、巴金、曹禺、張天翼、以群、葛琴等63人联署。刊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上。

二十四、病中答“救亡情报”記者訪問,談关于几个重要問題

1936年6月,魯迅扶病接見“救亡情报”記者,对当前的“学生救亡运动;关于联合战綫;目前所需要的文学;新文字运动”等提出了意見。表示了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的态度和立場。(原刊1936年6

月“救亡情报”,轉刊于“夜鶯”第一卷第四期,唐弢編“魯迅全集补遺”曾收录。)

二十五、“文艺界同人为团結御侮与言論自由宣言”

1936年9月,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界的抗日統一战綫組織更加巩固和扩大了。当时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合签署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結御侮与言論自由宣言”,标志了新旧文学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空前的大团結,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政策的胜利。在此签名的,有魯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鐸、郁达夫、郑伯奇、夏丏尊、叶紹鈞、洪深、陈望道、丰子愷、謝冰心、巴金、王統照、周瘦鵬、包天笑等21人。这个“宣言”刊于1936年9月20日出版的“新認識”第一卷第二期上,又轉录入1936年10月新潮出版社的“国防文学論战”一书中。現收入“中国現代出版史料”(乙編)中。

布拉格的“魯迅图书馆”

在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內,有一座專門收藏中国书籍的图书馆即“魯迅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是1951年东方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汉学家普实克先生訪問中国后成立的。它的服务对象是东方研究所的汉学研究工作,同时也为一些懂得中文的本国讀者服务,中国在捷克的留学生也常到該館借閱书籍。“魯迅图书馆”內分三个組:一个是采編工作組;一个是期刊文献組;一个是西藏組。目前,它拥有中文书籍52,833册,分两个书库收藏。一个书库中大部分放的是中国珍贵的古典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庫全书”、“廿四史”、“古本戏剧丛刊”等。在这个书库里还陈列着許多已經譯成捷文的中国古代著作,如“孙子兵法”、“論語”、“李白詩集”、“聊斋志異”以及一些現代文学作品,其中有毛主席的詩选,魯迅、赵树理的小說等。另一个书库收藏的大都是中国解放后出版的书籍,如“毛澤东选集”、“魯迅全集”、“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老舍选集”以及其他的政治、經濟、历史、文学和艺术著作。除了书籍之外,还收藏有中国新出版的各种杂志、报纸,其中包括全套的“小說月报”和“新青年”杂志的合訂本。这个图书馆的負責人

很为收藏这些宝贵資料而感到自豪,他們十分重视这些很难买到的杂志,因为它们記載了中国革命文学某一时期的情况。

近年来,东方研究所的汉学研究工作着重注意对中国近代和現代历史、文学和艺术的研究,特别是对解放后中国文化的飞跃发展感到极大的兴趣。因此“魯迅图书馆”也大量收集近代和現代的书籍、杂志、报纸和各种資料。他們除了在国内书店购买或和中国的一些单位进行交换上述資料外,有时也派专人直接到中国来收集。

到“魯迅图书馆”参观的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不只是由于在这里能看到中国新出版的各种书报及好客的主人的热情招待,而且由于語言不通所造成的困难不存在了,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說中国話。

“魯迅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着书刊交换关系,根据中捷文化协定相互交换着新书。

“魯迅图书馆”成立十年了。該館在促进中捷两国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将象中捷两国的友誼一样,日益巩固和发展。

(健)